试论秦始皇陵葬制的突破

张卫星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　西安市　710600)

秦始皇陵的陵园形制既有秦国传统的因素又有关东地区陵园的特点，还有一些新出现因素；秦始皇陵的陵寝与秦代祖庙之间的联系，突破了先秦时期宗庙祭祀的框架，体现了宗庙祭祀向墓葬祭祀的转折；随葬制度之中的正藏内容体现了以墓主为中心的宇宙模式，而外藏内容则是墓主日常生活的各种必要保障。通过对秦始皇陵葬制中陵园制度、陵寝制度、随葬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陵所表现出的葬制特征既是对先秦以来高等级墓葬传统的继承，也有突破。继承的是先秦葬俗中的各种外在形式，但内涵上则突破了传统的约束。秦始皇陵葬制中所表现出的形式与内涵间的矛盾，正是秦代皇权迅速发展在丧葬制度中的体现。

一、秦始皇陵的主要考古发现

上世纪 60年代，陕西省文管会对陵园进行了科学调查和钻探[①]，自上世纪 70年代发现了兵马俑陪葬坑后，考古工作者已经基本上探明了秦始皇陵区的地上、地下遗存，对一些建筑遗迹和包括兵马俑坑在内的大量陪葬坑进行了发掘，这些成果构成了认识秦始皇陵的主要材料基础。

秦始皇陵园的主要建筑被安置在两重城垣所构成的长方形区域内。地面遗迹主要有封土、两重城垣及其附属设施、寝殿、便殿、园寺吏舍、飤官遗址等。秦始皇陵封土的为覆斗状台体，1962年测量封土的底边南北长 350、东西宽 345、高 76米。内外两重城垣都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内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半部又由一道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区。内城垣目前共发现 6座城门，东、西、南三面各有一门；北垣有二门，内城东西向隔墙上有一门。陵园外城基本上呈长方形，城墙局部经过了试掘。陵园内城北部有大面积的地面建筑，分为三组。其中位于始皇陵封土北侧、面积 3524平方米的一个遗存经过详细钻探，推测为陵园的寝殿。在寝殿之北，还曾发现大面积的建筑遗迹，20世纪 70～90年代分别进行了发掘[②]。在西内外城间北部，1981年和 1995年曾分别发掘了一处建筑群南端的部分建筑基址，出土的饮食器上刻有“丽山飤官”等陶文，据此判断该建筑群中应有飤官遗址。

秦始皇陵园内外主要的地下建筑有墓室、陪葬坑、陪葬墓以及地下阻排水系统等。关于地下墓室的钻探与发掘主要集中在外围的地下阻排水系统、地下宫墙、地下空间的确认等。秦始皇陵地区的地下陪葬坑已发现 180余座。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和发现的陪葬坑被陵园园墙分为外城以外、内外城之间、内城以内三个相对区域。其中陵园外共四处，有兵马俑坑、动物坑、上焦村马厩坑、K0007[③]；内外城之间西部有 49座小型坑，包括珍禽异兽坑、跽坐俑坑和葬仪坑，另外还有曲尺形马厩坑和双门道陪葬坑[④]，西南部还有 K0004、K0005等，内外城之间的东南部发现 K9801、K9901、K9902等陪葬坑[⑤]。内城以内的陪葬坑位置一般紧靠封土，北侧有 7座，西侧有铜车马坑、长方形坑、K0003，南侧有 K0006、K0002、K0001，东侧有 K0204、K0203。2002年在封土的北侧及东侧新发现一座由砖坯围成的特大形组合陪葬坑，包括 K0101、K0201、K0202、K0205[⑥]。秦始皇陵园内外发现的墓葬主要有 7处，陵园内封土西北角甲字形墓[⑦]、内城东北部的小城内及东内外城之间小型墓葬、上焦村墓葬[⑧]、兵马俑坑附近甲字形墓、西内外城之间墓

葬[9]、砖房陪葬墓[10]。

通过对以上秦始皇陵考古材料的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陵遗存的主要内容体现了陵园制度、随葬制度、陵寝与庙制三个方面的内容。从这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特点看，秦始皇陵虽然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陵园制度的传统，但是从更多的方面来看则突破了先前的葬制规定，从汉代帝陵的考古发现看，秦始皇陵确立了相当多的可属于制度层面的规范。

二、秦始皇陵葬制的继承与突破

1. 陵园制度

严格讲独立陵园制度是春秋战国新出现的高等级埋葬形态，有别于此前贵族死后入葬于传统公墓地的集中公墓制。赵化成将商周时期公墓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多代王墓集中埋葬，仅见于安阳殷墟侯家庄商代后期王陵；第二类，多代诸侯国君及其夫人并穴而葬，典型例证是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第三类是国君及其夫人宗族成员集中埋葬，见于三门峡虢国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等[11]。

东周时期陵园制度的发展有两个系列，其一是位于西方的秦国发展序列。秦国的陵园制度最初萌芽于公墓制，最早出现于秦国的雍城墓地。整个陵区东西长约 12、南北宽 3公里。目前已钻探出的 49座大墓，根据形制、布局和隍壕设施，分为 14座陵园[12]。除十四号陵园坐北向南外，余皆为坐西向东[13]。这些陵园的典型特征是外部以隍壕分隔成相对独立的区域。秦东陵从陵园建制上看，主墓形制有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大墓的形制、规模和凤翔秦公陵园类同；亚字形大墓在方向、规模、深度、墓道设置壁龛、车马坑位于东墓道右上方以及设置隍壕等方面与凤翔秦公陵园相类[14]。

陵园发展的另一个系列是关东地区战国王陵。在陵园标志上，关东地区国君级别的墓葬多以地面墙垣来作为陵园的界标，如平山中山王墓[15]、辉县固围村魏国墓[16]等。中山王墓的地面上有封土、享堂等，地下有墓室、陪葬坑、陪葬墓等。辉县固围村 1～3号墓是魏国王室的异穴合葬墓，三墓并列，以最大的 2号墓居中，地面上建有享堂、封土。楚系墓葬中曾侯乙墓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大墓，时代在战国早期[17]；淮阳马鞍冢据推测是战国后期东迁楚王的墓葬[18]，包山楚墓是战国中晚期另一组高级别的楚国墓葬[19]，从这些材料结合其它大型楚墓的材料，可以看出东周时期楚系高等级墓葬地面上也以封土为标志，地面下有大型的墓室、陪葬坑。

秦始皇陵园是独立陵园制度确立的标志，它体现出的形制特征既有秦国传统的因素又有关东地区的特点，此前多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论述，如马振智在论述秦国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中有自己独特之处，表现在陵区的选择、陵园布局和形制、陵园的防御设施和门、陵墓形制、封土的出现、墓上建筑等诸方面与关东诸国不尽相同[20]；此外徐苹芳[21]、石兴邦[22]、杨宽[23]、袁仲一[24]、韩伟[25]、王学理[26]、刘士莪[27]、尚志儒[28]、程学华[29]、张占民[30]、段清波[31]等也有过不同的论述。我们现在看到的陵园建筑内容实际是陵园设计理念的物质载体，秦始皇陵的陵园制度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值得进一步深究。

第一，陵园建制中具有都邑的特点。在秦公陵园的考古发掘中墓围沟是雍城秦公陵园的重要遗迹之一，田亚歧认为墓围沟的使用可分为三种类型：单围沟、双围沟和套合围沟，围沟功用包括界域和护陵两方面。而到秦芷阳陵则以自然河沟环围陵园，其使用与当地自然地貌相关[32]。而到秦始皇陵园在地面上不再设置隍壕，以地面上的两重城垣作为陵园的界标；内城城垣具备基础、墙体、门阙、廊庑、散水、角楼等建筑要素；在平面布局上采取大城、小城、夹城的布局方式。上世纪的研究中杨宽就指出陵园宏观布局“若都邑”，布局中有秦都咸阳的因素[33]，虽然这一论断还需从考古实践中进一步验证，但是秦始皇陵陵园中都邑因素是以前的陵寝中从未出现过的内容。袁仲一曾比较了秦汉帝陵这一方面的异同[34]，焦南峰也认为汉阳陵陵园的建设受到了汉长安城建筑布局的影响，汉阳陵的陵园有可能象征和代表的是西汉王朝的都城长安城；帝陵、后陵、“罗经石”遗址、外城分别是未央宫、长乐宫、礼制建筑、城垣在阳陵的地下再现[35]。从汉陵及秦始皇陵的考古成果看，秦始皇陵园建制这方面的内容应该具有源头性的特征。

第二，陵园在不同的区域设置不同陵寝设施，这一特点也与陵园建制中都城的特点相对应。秦始皇陵园内安置的主要陵寝设施有：封土与地宫，这是陵园的主体建筑，面积占绝对地位，意义也是最重要的；祭祀建筑，不仅有寝殿、便殿，还包括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建筑如飤官、园寺吏舍等；地下陪葬坑、陪葬墓，亦分置于不同的区域；此外陵园还专门设置有保障陵园安全的设施及作坊、刑徒墓地、陵邑等。这些遗迹被两重城垣分隔为外城外侧、内外城间、内城内与封土间、封土下四个相对区域。不同遗迹内容在不同区域的分布目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但是离封土越近，陵园的内容越重要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再者从陵园设施的功能看，不同区域的陵园设施的功用既有丧葬功能，还有陵园使用后的祭祀功能，此外还考虑了陵园管理、安全、供给等功能要求。这一特点是秦始皇陵园制度中独特的一面，也为汉代陵园所继承。

第三，陵墓选址上既独立，又相对集中。秦始皇陵园与其父辈、祖辈等先祖所葬的东陵虽同为骊山区域，但二者所处的小范围地理区域不同，距离亦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根据出土材料，秦始皇陵已被单独命名为“丽山”，所以学者认为郦山陵实际上与秦东陵处于不同的体系中[36]，再者始皇陵的选址中也没有考虑到继任者陵地位置安排问题[37]，所以从陵园的选址到陵园功能的设置，秦始皇陵确立了独立的设计意图。但是这个独立还具有相对的特点。目前尚没有发现秦二世墓的具体位置，与始皇陵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工作的验证；秦始皇陵园的西侧发现了四座高级别的墓葬，其中一座为中字形，南北方向，附近发现有陪葬坑，袁仲一认为采用这种葬制的应该是君王级别，墓葬主人可能为秦王子婴或秦始皇后妃，秦王子婴的可能性较大[38]，如此则秦代帝陵还是相对集中于骊山北麓。西汉帝陵陵园的设置与秦始皇陵的特点基本一致，既采用独立的陵园制度，但还有相对集中的特点，除霸陵、杜陵处于长安城的东南外，其它诸陵仍集中于渭北咸阳原一带。

2　随葬制度

目前国内发现最早有目的的随葬品出现于距今约一万年的山顶洞人葬俗中，此后葬制的一项主要内容便是以各类物品随葬。

墓葬随葬习俗发展中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步伐相协调。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文明发达地区逐渐形成了前礼制社会墓葬随葬的基本理念，并延续到了商周时期。虽然随葬的实践从未终止，但是对随葬品分类的理性规定出现的相对较晚，文献比较明确的如《仪礼·既夕礼》的记载：“陈明器于乘车之西……”在这些明器中特别说明无“祭器”，但是有“燕乐器”、“役器”等。虽然墓葬出土考古材料中包括有大量的器物，但是这些器物的性质比较复杂，与文献内容虽然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还应该从更宏观的范围来把握随葬品的性质以及制度层面诸问题。从考古出土物看，先秦以来墓葬随葬品基本上可分为六类：第一类礼乐器，第二类生活用器，第三类威信仪仗用器，第四类镇墓辟邪用品，第五类供献祭祀品，第六类明器。春秋战国以前墓葬随葬品以第一类礼乐器为主，兼有第二类、第三类用具，墓圹内埋藏人物、动物牺牲；春秋战国动物牺牲持续使用，而人殉却被木、石、陶质俑所代替，第四类镇墓辟邪用品在楚墓中出现并得到发展[39]。随葬器物的变化正是社会制度转变的表现，到汉代这种转变基本定型，各种日常实用器、代表舒适生活的各类俑人及车马居室等明器成为主要随葬品。这种趋势反映了社会集体意识的转变：以礼器为主的随葬方式所强调的是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政治地位，而以日常实用器为主的随葬方式则比较关心死者在死后世界的财富和舒适生活[40]。

除了墓室内大量的随葬物外，先秦墓葬中墓室外还有随葬物品迹象。这些墓外随葬内涵包括人、动物、车马、器用等，其性质可分为殉葬、祭祀、储藏等。车马是墓外陪葬最重要的内容，车马陪葬的数量、规格代表着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等级，成为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重视的是，战国晚期的中山王墓在车马陪葬坑之外还设置了杂殉坑、船坑，开始突破传统的车马坑葬制[41]。

秦始皇陵的随葬品分为墓内随葬和墓外随葬两个部分。关于始皇陵墓室内的情形，目前仅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相关记载：“穿三泉，

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汉书·楚元王传》：“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此外《汉书·贾山传》《汉书·刘向传》《汉旧仪》等文献也有记载，但多因《史记》的记载而来。近年的考古勘察越来越证明《史记》的相关记载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从文献记载看，秦始皇陵墓室的结构与装饰实际上是对宇宙的模拟，墓室内的随葬品也全非珍宝之类，就这些文献材料看，始皇陵墓室内的器物与先秦以来的墓葬随葬内容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完全不同。

与墓室内随葬情形尚有文献记载不同，地宫外的陪葬内容文献毫无记载。现代研究者多以外藏系统定名之[42]。袁仲一认为秦始皇陵与先秦陪葬坑相比，陪葬坑类型及内容丰富；陪葬坑分布广，数量多，规模大；陪葬坑的形制结构复杂；陪葬内容的明器化。这些陪葬坑从内涵上可分为车驾厩苑、武备、苑囿宫廷娱乐、府藏四类[43]。我们认为从各陪葬坑具体特征、遗存内容和各陪葬坑内涵的整体相关性考虑，这些陪葬坑的主要内涵或内涵所表明的主旨分别是人员、动物和器用，以此作为分类标准，秦始皇陵陪葬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人员作为陪葬主要内容，从出土内涵看，由于目前陪葬坑内没有发现过真人，这里的人员主要是指各种陶俑；第二类，以动物作为陪葬主要内容；第三类，以器用作为主要陪葬内容，出土物包括车马、车马器、兵器，以实物替代品为主，涉及到的陪葬坑有铜车马坑、K9801号坑等。以上三类内容中真实的动物、模拟的器用处于陪葬内涵的最高层次，其次是模拟的动物，再次是俑和真正的器用。三个层次的陪葬坑内涵中均有表现少府属官的内容、两个层次中具有太仆属官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数量众多；在所有的陪葬内容中，兵马俑所表现的中央驻军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可见在陪葬内容的选择上，这一部分既是必须的，但不是表现的重点。在事死如事生原则下，秦始皇陵的外藏系统陪葬坑所努力恢复的正是始皇生前所必需的生活内容，这些内容以其日常生活需用为主，并辅以安全保卫的内容[44]。这些陪葬坑在形式上虽然采用了传统的车马坑形式，但内容上远远突破了春秋战国车马陪葬的范围，也大大超出了中山王墓船坑、杂殉坑的内容。这些随葬内容大多数也发现于汉景帝阳陵封土下的陪葬坑，性质上两地的发现有相近之处[45]，可见就随葬制度而言汉陵中的许多因素的源头在秦始皇陵。关于汉陵对秦陵的继承，正如焦南峰所论，汉阳陵继承并发展了秦始皇陵有关的外藏系统的设置理念，且使之进一步规范化[46]。

3. 庙制与陵寝制度

秦始皇陵园另一项重要的葬制内容就是陵侧出寝，这项葬制内容对后代陵墓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秦始皇陵陵侧出寝在制度层面涉及宗庙制度与陵寝制度的内容，从深层次看更是秦代祖神思想变化影响的结果。

从龙山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社会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宗教信仰[47]，在现实生活中庙、墓分别为祖先崇拜的两个中心，宗庙、陵墓从物质层面的建筑结构到制度层面的礼仪、规定等均受到祖神信仰观念的影响与制约。秦代，在信仰领域最重要的部分即祖神与至上神的观念，秦始皇做了重大变革，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变革帝号、谥法对祖神重新作了规定。如文献所载，帝号来自最尊贵的称呼，这在当时人看来其尊贵程度确实无以复加：“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除谥法，割裂了与先祖的关系，首先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后来又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就在秦帝国树立了新的祖神崇敬对象，庙制的变化正是基于这一信仰变化前提而展开的。

第二，以天极连接信宫而导致至上神观念变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

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这样信宫的建立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是连接天极，其二连接郦山陵。这样把郦山陵 - 信宫 （极庙） - 天极视为一体的做法与这一时期的天文观念变革有密切联系。在春秋战国秦人的至上神、祖神信仰体系中有多位帝，随着秦统一天下，以前的天上诸神世界与人间的变革并不协调。通过分析 《史记 ·天官书》可以发现战国以来天文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立了新的星空秩序，《史记 ·天官书》记载这个体系将北斗为中心的北天区和二十八宿分布的赤道带和黄道带分为五个区域，其中以北斗作为重要的授时星象组成中宫，二十八宿与北斗的相互联系组成了四个象限宫，即东宫、北宫、西宫和南宫[48]。天帝的居所即中宫，在北天极[49]。这样就将以前天上多位帝的格局统一到居于中宫天极之帝的统治下。秦代天文观念变革的核心是天极的建立，这样就将以前天上多位帝的格局统一到居于天极之帝的统治下。而秦始皇对郦山陵 - 极庙 - 天极的做法，无疑是将人间帝王的权力与这一时期的至上神中宫上帝重新作了规定，这样使得纷乱的天文秩序与统一的人间统治秩序重新对应起来，建立起了自己统治的至上神基础。

进一步分析这种转变的思想原因，可以看出这是秦代祖神与至上神信仰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此前我们有专文讨论了这一问题[50]。从文献与考古材料看，这一变革不仅影响到了宗庙的建筑的位置结构、祭祀方式等层面，而且还影响到宗庙的制度层面。祖神信仰的另一个中心墓葬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因而导致墓葬制度中的某些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庙制的变化与陵寝制度的变化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秦始皇陵陵侧出寝。虽然有考古调查材料反映秦东陵在墓侧也可能设有寝，东周晚期中山国、魏国王陵级别的墓葬也有园寝，李学勤也指出秦始有园寝是不正确的[51]，但是从汉代对秦陵寝制度继承上看，这项制度是在始皇郦山陵得到确立的。

秦始皇时期的宗庙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宫作为始皇生时设立的庙，其位置在渭南，与传统都城内设庙不同。上世纪 50年代在西安北郊发现了一片秦汉时期的古代建筑基址，北面是一个方圆数百米的大土台，在这一大土台的南边1里许为四个小方土台[52]；聂新民曾著文讨论此处应为始皇极庙[53]。这处建筑与始皇的郦山陵基本处于一条东西直线上，二者间并无大的阻碍，与自极庙道通郦山的记载似可吻合。

秦代庙的结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庙与宫室建筑的结构形式一致，采用前朝后寝的形式。岐山凤雏甲组遗址[54]、凤翔马家庄建筑遗址[55]分别是西周时期或周人灭商以前、春秋时期典型的宗庙遗存，其基本建筑结构为前堂后室的两进院落。春秋时文献记载庙的结构已发生变化，庙、寝二者已不相连，出现分离的趋势，到了秦代，庙寝似已变为两处建筑，《史记 ·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元年曾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杨宽据文献认为始皇庙已分设有庙和寝[56]，还有学者进一步论证此处的寝指的是陵侧之寝[57]。秦始皇陵的封土北侧及内城西区发现三组建筑遗存，袁仲一认为其中的甲组建筑为陵寝的正殿即寝殿，乙、丙组为附属建筑即便殿[58]。

随着陵侧设寝，宗庙祭祀的一部分内容便转化为陵寝祭祀。其主要内容为“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汉太常下属有园令 （或称寝令），掌管寝园，负责陵寝的日常管理。

三、秦始皇陵葬制变化原因的探讨

从秦始皇陵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看，其葬制并没有脱离先秦以来所形成的传统，我们重点关注的陵园制度、随葬制度、庙寝制度都可在先秦葬制中找到其渊源，这是秦始皇陵对先秦葬制传统的继承方面；我们还看到在随葬制度、陵寝制度等方面，秦始皇陵对先秦传统从形式到内容均做了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也就意味着突破。从秦代社会看，这种变化与秦朝的社会发展进程一致，体现了丧葬制度与新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协调。

从社会结构变化究其原因，秦始皇陵葬制变化的这些特点与秦代宗权的下降、皇权的膨胀有着密切的联系。殷周是尊尊亲亲的社会[59]，宗族关系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统治世族按尊尊亲亲的原则分配权力，宗族在空间上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地缘组织远没摆脱宗族血缘关系[60]。而秦国

社会结构的变迁不是渐进式而是跳跃式的发展，秦国在初建时虽也是宗族结构，但并没有经过山东各国宗族的充分发展、盛极而衰的过程，而是在宗族奴隶制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开始人为进行改革；变法使得秦国传统的宗族势力、宗族血缘关系荡然无存了[61]。战国后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以秦国为主角的兼并战争使得天下形势趋于明朗，秦齐二国各在西东称帝，在名义上已突破了王的称号。秦国统一天下后，议帝号、除谥法，各方面的新措施使得始皇与他的先祖基本割裂开来，而与新的封建帝国制度统一起来，秦始皇陵葬制所表现的特点正是以上变化的表现。

从思想观念变化考察，始皇陵葬制的变化也是先秦以来天人关系变化影响的结果。商周以来，流行的天命观认为人的意志由全能的上帝决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任何作用；春秋时期在孔子的思想中人的地位受到一定程度重视，此后的孟子、墨子思想中人的作用有所加强；战国时期荀子、韩非等将人的作用强调到过分的程度，发展到秦始皇又走向了极端，突出个人意愿，甚至为所欲为[62]。在思想领域的这一发展变化，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信仰领域，秦始皇从祖神与至上神信仰诸方面对天人关系作了重新规定，神权与膨胀的皇权的结合影响到制度的诸多层面；陵墓制度的诸多方面自然也在影响之列。

注　释

①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 8期。

②张占民：《秦始皇陵北寝殿建筑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研究（1956～1996）——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始皇陵秦俑坑考古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 11期；《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 5期；《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 12期；王兆麟：《秦始皇陵园发现罕见动物府藏坑》，《中国文物报》1997年 6月 22日；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 4期；《始皇陵东侧又发现马厩坑》，《考古与文物》1985年 2期；赵康民：《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五座马厩坑》，《考古与文物》1983年 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 6期。

④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园陪葬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 1期。

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秦始皇陵园 2000年度勘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 2期；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 K9801陪葬坑第一次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 1期；《秦始皇陵园 K9901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 1期。

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铜车马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0006陪葬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 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⑦程学华、王育龙：《秦始皇帝陵陪葬坑墓综述》，《考古与文物》1998年 1期。

⑧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 2期。

⑨程学华：《秦始皇帝陵考察报告》，《庆祝武伯伦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0年。

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⑪㊲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 7期。

⑫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 7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 5期；焦南峰、段清波：《陕西秦汉考古四十年纪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 5期；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⑬焦南峰、段清波：《陕西秦汉考古四十年纪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 5期；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 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 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 3期；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譽墓 —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

社，1956年。
⑰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 10期。
⑲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⑳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考古与文物》1989年 5期。
㉑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 6期。
㉒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相关的历史意义》，《秦文化论丛 (一)》，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㉓㉝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秦俑馆开馆三年文集》，1982年。
㉔㊽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㉕韩伟、程学华：《秦陵概论》，《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
㉖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㉗刘士莪、马振智：《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文博》1990年 5期。
㉘尚志儒：《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渊源浅谈》，《文博》1987年 1期。
㉙程学华：《秦陵、秦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8年 2期。
㉚张占民：《秦始皇陵园渊源试探》，《文博》1990年 5期。
㉛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相关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
㉜田亚岐：《雍城秦公陵园围沟的发现及其意义》，《秦文化论丛 (十)》，三秦出版社，2003年。
㉞袁仲一：《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异同的比较分析》，《秦文化论丛 (八)》，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㉟焦南峰：《西汉帝陵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 11期。
㊱张海云、孙铁山：《秦东陵再探》，《考古与文物》1993年 3期；张海云、孙铁山：《对秦东陵有关问题的几点看法》，《考古与文物》1996年 5期。
㊳袁仲一：《秦始皇陵西侧中字形大墓的墓主问题》，《秦文化论丛 (十四)》，三秦出版社，2007年。
㊴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㊵蒲慕州：《墓葬与生死 ——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
㊶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 1期。
㊷段清波、张颖岚：《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考古》2003年 11期。
㊸袁仲一：《秦始皇陵陪葬坑的主要特征及其渊源关系试探》，《秦文化论丛 (十)》，三秦出版社，2003年。
㊹张卫星：《秦始皇帝陵陪葬坑に關すろ新研究》，《東洋文化研究 (第九号)》，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2007年。
㊺焦南峰、马永赢：《汉阳陵帝陵 DK11～21号外藏坑性质推定》，《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08年。
㊻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6年 7期。
㊼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㊽㊾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㊿张卫星：《从信宫到郦山陵 ——论秦代至上神与祖神的变革》，《回顾与创新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馆三十年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
(51)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52)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 3期。
(53)聂新民：《秦始皇信宫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 2期。
(54)杨鸿勋：《古代宫殿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55)陕西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 2期。
(56)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
(57)史党社、田静：《新发现秦封泥中的“上寝”及“南宫”“北宫”问题》，《人文杂志》1997年 6期。
(59)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0)田昌五：《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
(61)臧知非：《共同的历史道路不同的发展进程 ——秦国社会结构与秦文化散论》，《秦文化论丛 (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62)金春峰：《两汉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责任编辑　宋远茹)